

世界应警惕“金德尔伯格陷阱”

——约瑟夫·奈在“北阁对话”上的发言综述

一、关于中美关系

随着过去一年多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有人用“新冷战”一词来形容当前的中美关系。但是，奈认为，中美之间不存在“新冷战”。冷战时期，苏联和美国之间几乎不存在贸易往来，苏联在美留学生仅250余人；而现今中美之间有着巨大的贸易总量，目前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约有35万人。

奈指出，目前中美关系的恶化并不是单纯的“特朗普现象”。即使特朗普于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选，即使民主党再次上台执政，中美关系也难以明显好转。美国政府会继续持对华强硬立场，特别是在安全和技术这两个领域。过去，美国商界和民主党对华立场比较温和，他们之中不乏为中国辩护的声音；但是近年来，这些人的对华立场也愈发强硬，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也认为中国没有和美国进行“公平”竞争。他们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从政府和国有银行那里获得大量补贴，导致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很难与中国的国有企业开展公平竞争。此外，在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他们也对中国的行为愈发不满。

* 2019年10月30—31日，北京大学第六届“北阁对话”年会在北京大学北阁举行。本次对话以“全球化世界上的分化现象”为主题。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前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校级杰出服务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出席本次对话，并就中美关系、人口与移民、国际秩序等问题发表了观点。本文根据约瑟夫·奈的发言整理而成，经本人同意发表于此。文章标题为编者拟定。

在奈看来，除了国有企业补贴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外，美国更担心的是技术与安全问题。以人工智能为例，中国领导人宣称，到2030年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世界第一。类似的宣示在激发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同时，可能导致别国对中国的意图产生误判。美国会认为中国计划赶超美国，从而取代美国在科技领域中的地位。因此，美国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上升，其对华政策将愈发强硬，而这又会促使中国认为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发展。中美两国均认为双方的战略目标互不相容，这会进一步加剧中美对立。中美如果都将对方定位为“敌人”，那么本可以避免的冲突或许会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所以，在政策宣示上应当注意“双重听众”现象，要考虑国内民众和国外民众的感情，避免产生战略误判。

奈认为，美国政府出于安全考虑禁止华为公司在美国运营，这一做法虽得到了一些美国民众的支持，但这并不等同于美国民众中弥漫着反华情绪。抵制华为并不意味着反华。正如中国政府为谷歌在大陆运营设限一样，两国均是出于安全考虑。另一值得关注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和学术交流等受到了限制。近来两国学者均有被对方国家拒绝入境的情况发生；一些准备赴美攻读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专业的中国学生无法取得美国签证。然而，中美之间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做法完全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会导致一种零和结局。

关于中美脱钩，奈认为，两国难以全面脱钩，但是会在部分领域内有所脱钩。在气候变化、传染病防治等领域，中美要寻求紧密“挂钩”。中美两国要做的是限制脱钩的广度和深度，并且避免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以免导致零和结局的出现。鉴于此，中美两国应该考虑把不同议题置于不同的“篮子”中，而非将若干议题联动挂钩，最终导致问题更加难解。

奈建议，首先，把中美两国较为容易达成共识的议题置于一个“篮子”里。比如，中美都应该按国际规则行事。在贸易问题上，中美都应遵守世贸组织规则，避免采取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避免损害他国利益。其次，中美彼此的安全关切亦可置于另一个“篮子”里。在安全问题上，中美虽存在分歧，但并非完全无法达成共识。以谷歌和华为为例，中美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若干共识，如谷歌在中国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华为在美国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后，中美之间完全无法达成共识的议题可置于第三个“篮子”里。中美在承认存在巨大分歧的同时，要对这些分歧进行有效管控，从而避免因其不断发酵而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二、关于人口与移民

奈认为，人口与移民问题，而非难民问题，是欧洲面临的长期问题。过去数十年，非洲人口迅速增长。以乌干达为例，过去 40 年里，乌干达人口由 800 万增长至 4000 万。在本世纪中叶，非洲人口总数或将超过中国。但是，非洲经济的发展速度表明非洲很难吸收如此众多的劳动力，而非洲移民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欧洲后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从经济角度看，欧洲需要非洲移民；但是从文化角度来看，非洲移民对欧洲社会带来了威胁，引发了一些社会混乱，这种现象未来还会持续。至少从这个角度看，欧洲的未来并不十分乐观。

三、关于国际秩序

美国兰德公司认为，国际秩序是一系列可以用来管理国际行为体之间关系的规则、规范和机制。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一书中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因为从来都不存在一套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规则、规范和机制。谈及世界秩序，必然会涉及 1945 年以后美国的霸权地位。奈认为，1945 年以后，美国建立的仅仅是“半霸权”，因为世界上很多人口（比如中国人和印度人）并没有生活在美国霸权所设置的规则之下。所以，关于“世界秩序”这一概念，基辛格认为类似于一个神话，奈认为基辛格的这一观点是合理的。

和世界秩序密不可分的一个问题是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小国是搭便车者，它们无需为公共物品买单，但也可享受公共物品，而且还不会因此被排除在国际体系之外。至于大国，它们认识到如果自己不提供公共物品，那么其国家利益也会受损。因此，出于自私而非无私的考虑，大国选择为世界提供公共物品。

美国在 1900 年前后已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美国依然选择搭便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力明显下降的英国无力继续维护全球海洋航运自由、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以及相对自由开放的贸易秩序，而美国又未代替英国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最终导致 20 世纪 20 年代末经济大萧条爆发，并进一步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就是所谓的“金德尔伯格陷阱”。二战末期，罗斯福及其继任者杜鲁门吸取了这一历史教训，决定建立相应的国际机制和国际秩序，即 1945 年以后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不过事实上，这一秩序并不完全自由，因为世界上依然存在众多专制国家和独裁者；也并非十分有序；也没有涵盖整个世界。

奈指出，如今有观点认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面临一个转折点，甚至

在走向消亡。持这一观点的人们认为，其背后的因素有两个，其一是中国的崛起；其二是民粹主义在众多民主国家的兴起，而民粹主义本身是反对自由主义的。从另一角度看，或许还有第三个因素：美国的衰落。

美国真的衰落了么？奈对此持否定看法。从地理位置来看，美国依然受两大洋的保护；美国人口在不断增长，直到2050年，美国人口总量都将居于世界第三；美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能源自给自足率高；在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美国仍然处于领先地位。虽然特朗普政府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冲击了国际秩序，但是特朗普政府迟早有下台的一天。而美国的上述优势并不取决于某个特定政府，它们是美国将长期拥有的优势。

相较于中国和民粹主义，奈对特朗普政府更为担忧。如果特朗普使美国重返20世纪30年代的孤立主义，那么，中国会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带来哪些影响？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但是奈认为更应该警惕的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即美国选择搭便车，而中国尚未准备好提供公共物品，如此一来，世界将更加危险。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民调数据显示，有60%—70%的美国人依然主张美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自身影响力。但是，如果特朗普获得连任，并且退出更多国际组织和机制，推卸更多的国际责任，那么世界秩序将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中国是否会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并提供更多公共物品呢？奈认为，在气候变化等议题上，中国的行为令世界深受鼓舞。而在南海争端等问题上，中国的行为又让一些国家感到忧虑。所以，关于世界是否会陷入“金德尔伯格陷阱”的担心依然存在。鉴于此，奈希望美国、中国、欧洲、日本等世界上最主要的经济体可以合作探索建立一系列规则，在这一系列规则的基础上，各国可以就存在分歧的领域和议题强化机制建设以管控分歧，避免对国际体系造成更大冲击。最后，奈总结说，即使在自由主义和国际秩序的某些方面达成广泛共识颇为困难，各国依然要努力探索合作之道。

（李博冉 翻译、整理；于铁军校）

编辑：崔志楠 审核：王缉思

地址：北京 北京大学北阁

邮编：100871

网址：www.iiss.pku.edu.cn

电话：+86-10-62756376

传真：+86-10-62753063

邮件地址：iiss@pku.edu.cn